

關於疫情禁足的 空間、身體及圖像考察

● 張 峻

2021年10月末，新一波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迅速擴散到國內多個省市，迫使中高風險區再次採取封控措施。作為管控區的一員，筆者自2020年以來已是第二次因疫情居家。這次居家激發了筆者對身處其中的微空間、微空間內的「身體」^①之思考，以及對空間的圖像考察。

一 關於疫情禁足的微空間

疫情期間，國內依據移動通信大數據產生的「黃碼」、「紅碼」，通過限制相應人員的流動來阻止病毒傳播。根據身體與空間的學術研究，當正常活動的身體進入受限的空間後，人的空間感知能力和思維活動就會被激活。如同相傳為古希臘詩人的荷馬(Homer)被預設為盲人，正是視覺功能的喪失，讓口述和想像力這些需要閉上眼睛行吟、潛心領會的維度得以凸顯。

居家「止語」，人們減少了日常不必要的社交與「廢話」。福柯(Michel Foucault)曾經表達過對於「說話的義務」的厭惡，並倡導一種不說話的交流方式；他一直喜歡讓安謐的學術氛圍來保護自己，「知識的作用就是保護個體的生存，並對外部世界進行理解」^②。如阿爾貝蒂(Leon B. Alberti)所言，在不被雜務干擾的環境，人們擁有自由閱讀的時間和身體，正好可以善加利用人類所擁有的三件「事物」：「他的靈魂(或精神)、時間和他的身體。」^③

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認為，家宅空間是「在千萬個小洞裏保存着壓縮的時間」^④。空間包含着「壓縮的時間」，既有過去的時間和狀況，也有當下的時間和狀況。可是在疫情防控制期間，有人可能錯過了另外的機遇，有人因此耽誤了某趟計劃中的火車、航班，延遲了某個婚禮、拜訪，錯過了某個節日，等等。韓炳哲在〈神聖時間——禁錮在沒有節日的時代〉中指出：「節日是一件不尋常之

事、一個特殊的場所，在其中人們與神同在，自身也變成了神。……如今，我們生活在沒有節日的時代，也因此失去了和神的聯結。」^⑤就像人們長時間被這次疫情所困，錯過了寒衣節；在2022年3月上海等地的疫情中，人們再次錯過了清明節，轉而通過網絡來祭奠，但這種虛擬的祭奠畢竟無法替代具體的行為和儀式所給予的心理安慰。

若視宇宙為巨觀，世界和民族國家為宏觀，城市和鄉村為中觀空間的話，不妨稱院落、小區和居室為微觀空間（以下統稱「微空間」）。這個微空間不僅是指物理建築，更在生活習性和精神向度上重塑着居住者。一種建築之所以能夠立得住，它起碼具備三個層面的功能和意義，即符合物理法則、滿足居住功能的「實用」層，傳遞某種意義的「象徵」層，以及承載居住者經驗的「想像」層。齊澤克(Slavoj Žižek)稱之為「三界的建築」——實在的、象徵的、想像的（他還提到了網絡空間的「虛擬建築」）^⑥。建築首先是人工建造的非自然之物，然後才可能與自然、天空和大地、人神發生和形成特殊的關係，所有相關的活動，如降生、成長、家族、宗教、政治、情愛、歡笑、哭泣、罪惡、仇恨、暴力、衰老、死亡、歷史都將在相應的建築空間內生成。鮑德里亞(Jean Baudrillard)辯證地指出，「建築同時創造了空間和非空間」^⑦，即在建築空間之外，還有更大的，沒有被建築所分割、所對象化的「空間」。由這兩種空間的劃分，我們想到了聖奧古斯丁(Saint Augustine)對「兩座城」的劃分，即「世俗之城」與「上帝之城」^⑧。

從哲學角度，空間是一個關係性的存在。在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

的「空間生產」理論中，空間不再是無生機的空洞化的物理或地理空間，而是容納着社會關係與社會生產的空間形式^⑨。「空間生產」如同商品生產一樣，是在經濟的、政治的關係性運動中生產出來的，既是消費、交換、使用的對象，也是空間再生產的工具，更是意識形態「跑馬圈地」的領域。詹明信(Fredric Jameson)也同樣在更廣義的消費主義的語境下指出，建築作為商品，就會形成它自己的意識形態。不論你相信何種意識形態，消費行為和消費主義自身就足以再生產一個體系，並使之合法化，「在這種情況下，在『意識形態』更為廣闊的體系中，發揮重要作用的不是抽象觀點、信仰、意識形態思想或者哲學體系，而是日常生活固有的實踐行為」^⑩。換言之，意識形態是化身



從哲學角度，空間是一個關係性的存在。（張駿攝）